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最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选择，这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

震撼世界的春雷

“列宁说过——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照此衡量，哪怕1911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都只是‘开了花，难结果’的‘半部革命’，看似国体发生重构，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仍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垄断了权力，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常因自身软弱而被消磨，至于劳苦大众的灾难性地位没有改变，中华大地依旧孕育着天翻地覆的能量。”李红指出，中国在近代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与西方接轨的部分工商业城市同广大贫困落后的农村并存，为新式革命造就了土壤。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过数十年发展积累，虽经甲午战败而几近毁灭，但许多官办、民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渐成气候，不仅造就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步诞生更为庞大的无产阶级。尤其1914—1918年一战期间，列强放松对华经济

顾正红纪念馆。摄影/张龙



侵略，过去横行中国市场的许多舶来品暂时退出，刺激了民族资本发展，据统计，大战以前1903年至1908年，中国平均每年注册工厂21.1家，1913年至1915年是41.3家，1916年至1919年高达124.6家。1912年至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3.8%，是1912年至1949年5.5%的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可以说，以一战为标志，中国近代经济出现一轮飞速发展，注入更多近代元素，工、商、学界民主进步力量大大增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无产阶级数量和质量显著变化，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达200万人，比战前增加近两倍，这就远超经济意义了。”李红表示。

“但这种‘靠天吃饭’的经济近代化，有着太多先天不足和后天匮乏，一战刚结束，外国资本以更强势头反扑，既没有主权独立国家关税制度保护，又没有足够消费市场的中国近代工商业顿时难以招架，难怪费正清把当时中国经济繁荣称作‘没有前途的奇迹’。”徐有威指出，如何打破“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中国人再次进行艰辛的探索，“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简单靠生产力自身改进无济于事，根本出路是重构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社会制度形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苦苦寻路的中国人看到希望。“堪比中国皇帝的沙皇皇冠落地，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统统扫除，无产者成了国家的主人。马克思的预言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徐有威强调，中国人看到世界上有两幅景象，帝国主义争霸的一战令欧洲混乱颓废，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尖锐形式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对走西方道路失望，把目光从欧美转向苏俄，“俄国十月革命的魅力，不光在于它对旧制度的破坏，更在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哪怕经历饥谨、内战、外国干涉重重磨难，却照样朝气蓬勃，这种内在生命力强烈吸引着我们。我们迫切渴望，马克思预言的那个理想世界，能否成为中国的未来？十月革命能否为解决中国困境指明一条新路？”

1918年11月的一个冬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顶着寒风，